

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

[作者] 刘大秀

[单位]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摘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加入世贸步伐的加快，中国也在加紧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它必然对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带来深刻的影响和严峻的挑战。我们党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就必须正视这种迅速变化的现实，清醒地认识全球化条件下腐败问题的新趋势、新特点，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措施，积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关键词] 全球化，挑战，反腐败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困扰之一就是腐败问题。腐败的蔓延会引发社会矛盾、政局动荡，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发出雷霆之声：“在党内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十五大对反腐败问题所作出的判断以及对反腐败所表达的坚定决心，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治理腐败的有效对策，增强反腐败的信心。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一大趋势

以马克思主义态度科学地认识全球化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每个国家和民族以及个人在全球化坐标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受到冲击的程度不一，所以，对全球化的解释自然会有所差别。

如，提出“全球村”的麦克卢汉从信息通讯角度，定义全球化是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

自由派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将全球化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

许多左翼学者从体制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

英国学者吉登斯从制度角度，把全球化管理理解为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

埃利亚斯从文化和文明角度，把全球化系统阐述为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

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角度，把全球化视为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达成的共识。

上述学者理解均有道理，但也有只从一个侧面、一个领域考虑全球化的缺憾。我认为，要界定全球化，应该把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因素均考虑进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它是发生在多领域、多层面上的、多种主体参与的多维度过程。其二，它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过程。其三，它又是一个不断出现冲突

的进程。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一大趋势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全球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可以说，21 世纪是一个真正全球化到来的世纪。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兴起，将在人类社会的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风暴。

——人类真正步入信息化社会。随着全球知识技术的传播与互动，频繁的科技交流和技术转让不可避免地成为可能。特别是以微电子学理论为基础、以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为主体、以国际互联网络的形成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逻辑地发展为现实。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快捷性，拉近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时空距离，出现了人类真正步入现代信息社会的曙光。

——经济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趋势中最为明显的表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各国经济、金融和贸易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彼此之间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跨国经营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并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

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自我的超前发展，就不得不动调它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一系列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反映在经济领域里就是各大公司纷纷合并，以发挥规模效益，增强竞争能力。

——全球文化大交融。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共同的文化观，成为全球文化大交融的动力和源泉。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文化，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在与其他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中寻求新发展。

最终，全球就会形成一种既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文化特性，又能充分利用不同文化的共同性，促进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发展新的文化范式。

——休戚与共观念的重铸。我们在沐浴全球化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有不测风云之虞。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机器人与自动化的威胁、资源与能源的短缺、人口爆炸与粮食危机、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科学技术对人与社会的负面影响、种族冲突、恐怖主义、黄赌毒、艾滋病等一系列国际性社会问题会扑面而来。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把每一个人变成了全球社会的一员，人们彼此之间都成了生活在同一“地球村”的联系紧密、利害攸关的“村民”，解决全球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地区的事情，而是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促使代表全世界人类整体利益的休戚与共的观念的形成。

全球化改变和影响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融入全球化并非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全球化在给我们带来巨额的国际资本、先进的技术和高水平的管理、更多的贸易机会的同时，也将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冲击。

——全球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有负面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既有便利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模式运作经验的机遇，又有西方国家议会民主、三权分离、多党制等民主形式的冲击和挑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搞得不好，我们就可能摔大跟头。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与国际接轨即如何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接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者是不能很好地掌握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造成两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和撞击，使我们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丧失发展的优势和机遇；或者放弃或丢失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完全同化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冲击。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主权、产业结构、市场占有、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民族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冲击更大。中国加入世贸以后，等于把国际竞争引入了国内，民族企业直接面对的竞争对手是拥有雄厚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跨国公司，竞争将是残酷的，民族企业面临如何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考验。

加入国际资本大循环，就意味着把国家经济置于国际投机资本的窥视之下，这就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是金融风险）。因为庞大的国际投机资本要搞垮或破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不良资产早已超过警戒线，所以问题就更严重。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严峻的挑战。全球化的运行规则不断扩大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权力，力图摆脱国家和政府的监控，这对传统观念上的国家主权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随着国际网络化，网上领土安全问题提上了全球化的日程表。

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掌握了这一高新技术，我们还只是刚刚迈进网络时代的门坎，对具有隐蔽性的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攻击、网上文化的渗透、享有网络信息霸权的不对称入侵，将会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新的安全观的重要指标，只有掌握了国家制网权，国家安全、国家主权才有保障。

具有全球化特征的腐败侵蚀我国，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

对腐败的性质认识多元化

世界各国理论工作者绝大多数认为腐败具有消极的后果，不存在什么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影响。腐败影响政治稳定，有损于国家权威的公正，对国家权力造成巨大危害，有损于政治领导人的声誉；窒息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妨碍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和援助；毁灭人类的信念和美德，使人丧失良心，引起道德的堕落。

然而，国外的少数专家学者却提出了腐败有功的谬论。其要点有：

（1）是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起飞。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他认为，传统的法律或官僚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腐败行为常常是跨越这种障碍的有效手段。他说：“一定程度的腐败是帮助轻松地踏上现代化道路值得欢迎的润滑剂，通过少量的腐败行为，一个发达的传统社会可以得到改进，至少可以现代化。”

（2）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美国学者戴卫·白利认为，政府本身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决策一贯正确，如果社会有关方面通过某种活动（腐败）来影响政府决策过程，便有可能使决策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作出更好的决策来。

（3）可以提高政府官员的质量。戴卫·白利认为，如果政府的工资不足以满足一位有才华的官员的需要，那他就会另谋他职。如果存在通过腐败活动得到好处的机会，社会上有才干的人就会倾向于进入政府系统工作，从而提高政府动作的质量。

(4) 可以调整社会运行中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暴力和行贿是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方法,两者相比,行贿要和平一些,它起的是稳定现存秩序的作用。只要掌握财富的权贵能向政权权贵行贿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就不太倾向于用他们的金钱去资助推翻政治制度的暴力集团。

以前,由于政府易于控制传统的舆论传播工具,这些谬论不至于广泛流播,人类步入信息社会,特别是互联网成为传播媒介的重要载体以后,上述谬论以光的速度向我们渗透,与国内“反腐败与发展经济对立论”、“腐败大气候论”、“腐败不可避免论”相互交溶,动摇了自古及今在理论学术界所倡导的腐败可以亡党亡国的定论。以多元化思想为指导的反腐败实践,必然是信心不足,消极应付,从而使腐败的危害性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化。

法规、制度不适应全球化新要求

(1) 惩处腐败的有关条文有待修改、完善和调整。我国法律与世界各国法律对腐败界定的差别,为腐败分子提供了机会。随着经济全球化,腐败分子会利用各国法律系统的差别,采取“挑选法律”的做法,创造众多的违法犯罪的机会。换言之,企业可以挑选法律环境较为宽松的国家进行经营活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如,我们国家在法律上尚未规定跨国公司的人员是腐败的主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大地上的)在招标合同时,就有可能采取腐败的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而我们司法机关对其制裁却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

(2) 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的日益扩大,传统的监督模式受到了冲击。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领导干部的社会联系和活动空间日益呈现出增大的态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干部监督模式,是为监督干部的工作圈而设计的。在当时条件下,社会环境、干部业余生活和社会交往都比较简单,在生活圈、社交圈出问题的很少。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人们的对外交往逐步增加,在生活圈、社交圈出问题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只对干部工作圈进行监督的传统模式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在时间、空间和接触人员范围上受到很大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组织对干部了解的深度和广度。

腐败出现新趋势,查处打击腐败困难化

(1) 警惕腐败手段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国际互联网的接入,使腐败的方式变得简单、快捷而隐蔽,使我们预防、控制、打击腐败的难度加大了。腐败分子利用计算机及网络实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腐败的案件逐渐增多。

计算机及网络上的腐败行为,在高科技的护卫下,频频得手,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利用高新技术腐败已成为一个新的犯罪增长点。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运用领域越广泛,普及程度越高,电脑和网络腐败的危害性也就越大。这类案件已从金融、证券等领域,向邮政、电信等领域蔓延。

计算机系统具有智能性、技术性,国际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超时空性等特点,使得腐败行为具有快捷性、隐蔽性。腐败分子可以利用内部管理漏洞和安全防范技术缺陷,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完成腐败行为的全过程。行贿者有可能只需要进行一次网上交易就可能把一位领导干部拉下水。腐败分子直接利用电脑及网络而无须和人打交道即可以达到行贿或受贿的目的,还可以不动声色地运用技术手段轻易地抹掉交易的痕迹。

特别是电子货币的研制和开发,地下银行的设立,腐败分子转移赃款和处理黑钱更加容

易。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系统中代表一定资金的数据，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的财产形式，改动这些电脑数据就会导致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的资金所有权的转移。

利用计算机及网络进行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其对象是特定的电子货币。电子货币与电脑系统、网络技术、信用卡、合同书、财务凭证等各种载体相联系，导致腐败更趋复杂化。腐败分子将大量现金存入国际金融体系，易于被人觉察，而电子货币的数据资料存储在电磁介质上，人眼根本无法直接看见，只需要敲几下键盘或按一下鼠标，就会把存款在全球联网的国家银行周游一遍。

而电脑系统中的数据记录也容易被修改和删除，腐败分子作案后可以轻松快捷地毁灭罪证，导致侦查取证非常困难。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加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建立一套独立于正式银行之外的地下银行系统。赃款和黑钱的查询和跟踪愈加困难，而有些案发单位和个人害怕打击报复，知道内情不举报，调查取证不配合，使司法机关查处腐败分子罪证和打击腐败行为的工作加大了难度。

(2) 警惕腐败的国际化。加入全球化以后，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办公司、设工厂，将是很普遍的。国际资本的最大特性依然是追求最大化的增殖。这种特性就可能使一些不法资本与国内腐败分子结合，前者获得超常的利润，后者中饱私囊，坑害的是国家和人民。不要以为跨国公司就能帮助我们遏制腐败，其实他们中也有擅长搞腐败的，西方国家不断揭露出的政治丑闻，早已证实这一点。一旦他们与国内腐败分子结合，对国家经济乃至政治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警觉。

在全球化进程中，针对新情况，把握新特点，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

腐败已严重威胁和危害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断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为此，中央痛下决心，根除腐败，并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以三项任务为主体的工作格局及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这些是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必须坚持的方针和原则。

但是，还必须针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把握全球化时代腐败问题的新趋势、新特点，拿出新招数，采取新措施，不断把全球化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推到新境界。

科学把握反腐败的性质，客观评价反腐败的状况，坚定反腐败的信心

(1) 对反腐败的性质，江泽民同志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其理论依据是，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会导致共产党性质的改变；腐败的滋生蔓延会导致党的宗旨改变；腐败的滋生会给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为反对势力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口实；腐败的滋生蔓延会影响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动乱，进而丧失党的执政地位。江泽民同志对反腐败斗争性质的科学界定，有助于我们针对全球化条件下国内外出现的关于腐败性质的错误认识的澄清和批判。

“腐败有功论”忽略了腐败对文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公众态度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忽略了腐败对文职人员向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的能力所产生影响。由于腐败扰乱了高层决策，并任用了大量亲朋好友为文职人员，从而损害了发展等，可见，腐败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个人致富，而并非为大众服务。所以，世界各国高层政府人士将其谬论视为“一派胡言”，并有详细的数据加以驳斥。

“反腐败与发展经济对立论”，认为反腐败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对立的。说开展反腐败斗争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由此衍生出这样一种论调，先发展经济，搞好经济了，回过头来再开展反腐败斗争。这种观点依据是，党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反腐败，有可能导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它没有弄清反腐败与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犯了机械主义错误。

“腐败大气候论”是说，有些领导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还为自己开脱，名曰大气候决定的。这种人不明白大气候与小气候的辩证关系。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廉洁自律，从我做起，从本单位、本部门实际做起，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小气候，大气候也会随之形成。

“腐败不可避免论”的理论依据是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正处转型时期，腐败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这一依据是正确的，错就错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反腐败的态度不积极，我们也承认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应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正视腐败现象，坚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

(2) 对反腐败斗争的评价，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都犯过极端化错误。我们党的领导层和政府习惯从上往下看，看到周围人都是清正廉洁的，看到全党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就把成绩说得过高。老百姓习惯从下向上看，从自己身边的公款吃喝，看到的腐败现象去判断我们党一团漆黑，这两种认识都有片面性，给思想界带来很大的混乱。

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上下、左右多角度全方位来认识反腐败斗争现状这个问题。一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标准。我们不能拿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党风作参照物，也不能拿 50、60 年代党风类比，不能离开背景谈问题。

我们应从动态中去看，正确的标准是：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腐败是否被遏制到最低限度。

二是要把握两个估计。一个估计是我们反腐败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党的干部主流是好的，肌体是好的。1999 年可以说是反腐败斗争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年，许多贪官分子被严惩，另一个估计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要看到它潜在的危险性。从目前看，党政干部腐败层次越来越高，一把手越来越多；经济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政法机关的腐败相当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性案件增多，买官、卖官、杀官、骗官、跑官、要官现象上升。

三要量化分析。看腐败分子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占多大比例。根据中纪委统计，从 1979 年到现在处分的党员经过了三个高峰，一个低谷，即 1982 年 3.1‰，1986 年 3.4‰，1989 年 3.2‰，低谷为 1988 年 1.6‰。近几年来都在 2‰ 以下。按自然界的黑数理论 1:7 算，那么腐败分子实际上是每 100 名党员干部中就有一个，这样分析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深化改革，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土壤。比如：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对于解决反腐败有重要的作用。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重建社会社会信用基础；建立重大金融信息（可疑的金融往来）向政府部门报告制度；建立对借贷者划分信用等级并对不良客户实行“黑名单”制度，对有严重道德风险倾向的客户严格防范；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估、预警、监测、防范机制；走科技发展之路，实现服务电子化，等等。

这些措施，将对治理金融腐败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现行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方式，按照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制衡。

(2)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两大基石。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法制是清除腐败的利器。高度的

民主和高度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从制度上根除腐败之举。因此，需借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民主和法制的大潮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体制性腐败的问题。

充分发展并利用信息技术推进反腐败斗争

(1) 普及全民计算机知识教育，提升领导干部综合素质，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我们人口多，经济不发达，让十多亿人民同时达到熟练掌握运用计算机的水平还不现实。所以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定普及计算机教育的长远规划。

广大群众只有掌握了信息技术哪怕是简单的操作，才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真正享受到网上的民主权利。信息盲、科盲将被无情地排除在信息民主决策系统之外，领导领袖权威有被科学权威削弱的危险，所以参与决策的领导干部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问题就变得更为迫切，否则就会淘汰出局。

强调利用信息技术的同时，要不断强化信息安全意识。通过凭借身份证号码登录技术、安全等级设置技术、加密技术，避免虚假信息和有害数据的侵入，切实保障网上民主运作的真实性、可靠性、安全性。

(2) 建立领导干部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监督网站，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让腐败暴露在阳光之下。

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监督是我党在全球化时代对领导干部监督的现实选择。只对干部工作圈进行监督的传统模式理应让位于既能对干部的工作圈又能对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进行监督的新模式。

针对全球化腐败出现的新动向，我认为，在充分利用传统监督途径、方法方式的基础上，必须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渠道。党组织部门委托有关科研院所开发一套关于监督领导干部的软件，对每位干部实行动态监督管理；在国际互联网上注册领导干部监督网站，将被监督的干部一一登名造册，用户以真实姓名和身份证方可登入。进入网站后，可以就自己所了解的干部在工作、生活、社交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违纪问题录入留言板中，这不仅便于党组织及时发现线索，及时处理问题，也有利于领导干部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

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任何一位领导干部来说，最令其担心受怕的莫过于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而又与腐败相关联。特别是第四媒体——因特网的出现，全球通信和信息瞬间分享已非难事，不仅使领导干部保守秘密比以前更加困难，也迫使使其在这遍及全球的受众面前更加严格约束自己。

树立国际反贪合作意识，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

腐败的问题不仅是困扰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困扰全人类政治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这样。因此，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就共同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联合起来，拒绝腐败！

我们应顺应世界潮流，遵照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既定方针，立足于本国反腐败的优势，借鉴世界反腐败成功国的经验，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力争成为国际反腐败的标帜。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腐败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的危害超越了现有的国界，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必须转变“各自清扫门前雪”的旧观念，树立反腐败全球合作的新观念：国际反腐败合作不仅是符合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而且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所必需的战略。

各国腐败的来源和结果不同,每一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反腐败的优先战略选择。总的看来,提倡政治家的财产公开和经济竞争力的改革是减少腐败机会的关键。世界各国应在行动中进行双边和多边协调以揭发、防止和惩处国际贪污腐败行为,国际金融机构已经以各种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反腐败斗争。

1996年12月联合国就号召成员国采取“确实措施”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随后,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的提出是响应联合国号召的最初尝试;国际商会和经合组织在控制贿赂的供给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努力;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则瞄准了政府采购中的超级腐败作了有益探索。世银强化了这样一项规定,如果发现腐败,将取消对采购项目的资助并处罚有关责任方。目前,经合组织国家正在积极研究和制定对国家公务员接受贿赂的协定,试图通过使其国及公司的对外国家公务员行贿的行为有罪化,以增加处罚腐败源方的力度。

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首先要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有关贪污腐败的界定上与国际接轨,提高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有效性。我国与世界各国法律在对贪污腐败问题上都有明文规定,但是有所差别。

一是对实施腐败行为的主体有差别。其共同点是均将本国公务人员规定为腐败的主体,同时也将行贿人纳入腐败的主体。但是,在我们的刑法中,并没有规定私营部门、跨国公司的雇员、外国公务员作为腐败行为的主体。

二是在所规定用来进行行贿的内容有差别。各国法律共同点是视金钱和物品为行贿物。但是,我国的法律尚未规定金钱和物品之外的非物质利益如提供职位、关照、免受纪律处分等也是行贿的证据。

现行法律是根据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制定的,但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日渐加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法律对贪污腐败问题的规定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参与全球反腐败的合作。

鉴于此,很有必要针对全球化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新趋势,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期提高反腐败的有效性。当前,我们加强国际合作,应着力打击携巨款逃往境外的犯罪分子,并强化对在国外存有巨款的国家高层腐败分子的侦破和惩处。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114>